

Duoyuan Piping
Shiyu Zhong
De Ertong Wenxue Yuedu
Shijian

多元批评视阈中的 儿童文学阅读实践

王 敏◎著



吉林
大学
出版社

Duoyuan Piping
Shiyu Zhong
De Ertong Wenxue Yuedu
Shijian

多元批评视阈中的 儿童文学阅读实践

王 敏◎著



吉林大学

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多元批评视阈中的儿童文学阅读实践 / 王敏著. --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5.7

ISBN 978-7-5677-4231-4

I. ①多… II. ①王… III. ①儿童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05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83053号

书 名: 多元批评视阈中的儿童文学阅读实践
作 者: 王敏 著

责任编辑: 矫正 责任校对: 王蕾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开本: 710mm×1000mm 1/16
印张: 15 字数: 210千字
ISBN 978-7-5677-4231-4

封面设计: 徐占博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2015年8月第1版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定价: 46.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 长春市明德路501号 邮编: 130021
发行部电话: 0431-89580026/28/29
网址: <http://www.jlup.com.cn>
E-mail: jlup@mail.jlu.edu.cn

走向前沿，走向大地

在儿童文学批评中，人们是很热衷谈“特点”的。理论一点，就是引用据说是高尔基的话：儿童文学是一个大独立国；粗俗一点，就是喊叫：儿童文学要姓“儿”。上课、写文章、编教材，无不将“特点”放在首先的、中心的位置。“儿童文学的特点”，“儿童诗的特点”，“儿童小说的特点”，一部儿童文学教材常常就是一堆“特点”的汇集。本来，儿童文学是文学整体中的一种类型，谈具体类型较多地谈到这一类型的特点，没有什么不可以。但一，谈局部不能离开整体，谈儿童文学必须将其放置在文学这个大背景下，离开了这个大背景，就像离开大地，把绿豆芽放到玻璃罩里面去养护、去关照，不是一点问题都不能说明，但终究是有限的了。二，那整体还必须是一个活的有生命力的整体，有理论深度的整体，从这样的整体高度出发，才易登高临远，成破竹之势。文学批评中有“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之说，虽然二者无法完全偏废，但没有一个好的“前视野”，皓首穷经怕也未必有多少好的结果。绿豆芽不能放玻璃罩里养护，放在沙漠里也无法长出健壮的植株。有些儿童文学教材也谈一般文学理论，谈来谈去就是“形象性”“情感性”“典型性”，粗疏呆滞，面目可憎。在这样的背景下谈特点，和将绿豆芽种在沙漠里也没有什么两样。或许是对此有点感受吧，我一直提倡写儿童文学评论的人要读点20世纪的文学理论，站在现代文学理论的前沿来理解儿童文学，包括其特殊性。只是才疏学浅，读得不多，理解得不深，更无法在实践中灵活地运用。每有触及，便遗憾不已。

现在终于有人较为全面、系统地来做这一工作了。王敏女士的《多元批评视阈中的儿童文学阅读实践》便是近年中国儿童文学研究在这方面一个卓有成绩的成果。作者的眼界很开阔。西方 20 世纪文学理论浩如烟海，有名目者就能举出数十个之多。其中有较适于儿童文学批评的，有较不适于儿童文学批评的，作者艺海拾贝，从中挑出社会历史批评、俄国形式主义批评、结构主义叙事学、精神分析、神话—原型批评、接受美学和读者反应批评、女性主义批评和生态美学批评等八种批评理论，颇见眼光。20 世纪西方文艺理论是世界文艺理论发展中的崭新阶段，不仅视角各异，而且博大精深，许多批评方法后面都有自身的哲学支撑，深入地理解颇为不易。在《多元批评视阈中的儿童文学阅读实践》中，王敏首先对自己选择的批评理论作出了自己的读解、介绍，大都较为准确。如精神分析，弗洛伊德的伟大贡献首先在发现无意识，而个体无意识主要来源于童年的创伤性经验，这种创伤性经验主要因为俄狄浦斯情结的失败、被压抑。作者不仅追述了这个过程，还介绍了西方一些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如贝特尔海姆等在童话分析中的运用，都很有见地。在选择、理解的基础上，作者展开了本书的重点：自己关于这些理论在中国儿童文学批评中的运用，即作者所说的“阅读实践”。一般说，在目前的情况下，说出几种西方 20 世纪主要的批评方法，对这些方法的内容作些介绍，并不难，但要理解得准确，阐释得有深度，运用得灵活、新颖，那就是另外一的事情了。这里，作者也显出了自己的功力。如生态美学，这是近几年才在中国广泛使用的一种批评方法，许多内容中国人还较为陌生，作者不仅将这种批评方法引进儿童文学，而且运用于具体作品的批评。作者对格尔勒其木格·黑鹤小说的阐释和评论便是很准确、很有深度的。借用现代西方文学理论是走向前沿，运用于具体的阅读实践是走向大地，王敏的《多元批评视阈中的儿童文学阅读实践》是在走向前沿的同时走向大地。

但西方 20 世纪文学理论毕竟是一个深邃广博的世界，将这些理论运用于儿童文学批评不仅有对这些理论本身的理解、把握的问题，更有东西方文化

差异、成人文学与儿童文学的不同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中的任何一个都不容易。在因长期缺少理论而变得浅陋，以致一说当代西方文论就感到陌生，甚至像鸵鸟一样产生出排斥心理的中国儿童文学批评领域，《多元批评视阈中的儿童文学阅读实践》是一次开拓性的实践。既是开拓，有些不够细致、不够深入、甚至不够准确都是可以理解的。关键是，作者试着这样做了，而且做得不错。可以肯定的是，在今后的日子里，将有更多的人走向这条路，并在实践中将这条路拓展得更加平坦和宽阔。西方 20 世纪文学理论产生于西方 20 世纪社会生活和文学发展的环境中，自有一些受那个环境限定的东西，对此，我们需批判性地化用，这是没有问题的。但对别人已经处在时代前沿的东西，首先的态度是认真学习。既有了《多元批评视阈中的儿童文学阅读实践》，我们就有理由对更多同类理论和实践的出现有更多的期待。

吴其南

2014/7/16

多元批评视阈中的儿童文学阅读实践

导论

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文学批评的理论和方法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形成了多种流派、多种学说共生共荣的繁盛局面：古老的社会历史批评在新的历史境遇中继续焕发着勃勃生机；俄国形式主义批评、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瞩目于文学文本，探求着文本自身的审美内涵以及深层结构特征；精神分析批评和原型批评将作家在创作中流露的潜意识以及激活的集体无意识作为自己研究的目标，将文学研究引向人类的深层心理和原始文化的层面；接受美学、读者反应批评则将读者的阅读视为文学活动中至关重要的因素，对读者的文学接受机制进行了详尽深入的探讨；此外，女性主义批评质疑历史文学中的性别歧视现象，对女性文学的书写提出了大量建设性的意见；生态批评则以捍卫地球生态圈、提倡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姿态重新打量文学写作，又为人们思考文学提供了崭新的角度……

这些文学批评及其理论因立足点的不同而呈现出多元的样貌，它们好似一束束角度不同的强力探照灯光，映照文学这座幽深的宫殿，使其内蕴的宝藏发出夺目的光彩。可以这样说，文学批评这个领域所显示出的人类智慧不比任何一门自然科学逊色，批评家们在探求文学的本质乃至人类审美精神领域的路途中留下了一道道深深的足迹，不断地深化和开拓着关于文学自身乃至文学与世界关系的思考。然而，文学批评在以强大的逻辑性、思辨性建立起自己严密体系的同时，它们也显示出一种严肃的学院风格和严谨的学术

导向，这一完全是由成人的专业学者把持的活动，对于一般读者包括年纪较轻的读者而言是那样的遥不可及，文学批评的学术成果与鲜活的文学阅读和讨论活动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隔膜。我们一边感叹于文学批评开疆拓土般的研究，另一方面又遗憾于这种研究不能服务于普通读者的文学阅读，无法使他们的阅读体验到更上一层楼的乐趣。目前，国内外一些学者开始关注文学理论及批评方法与阅读实践的结合，探讨多元的批评理论转化为读者阅读工具和方法的可行性。因此，深奥繁难的文学批评走下高高的圣坛，去到广场参与并引领大众的狂欢，这是文学批评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

对于儿童文学这片领土而言，上述成人文学批评的学术成果和话语有无用武之地呢？我国著名儿童文学理论家、作家班马在评价中国当代儿童文学探索性作品时肯定了儿童文学这一文体形态本身所含有的潜在因素：“它的沟通神话的古老。它的通向科幻的年轻。它的泛神论的亲近自然。它的哲学气的寓言本色。它就善于谈生态圈。它正可涉及异化。它拿手的就是梦、幻、魔。它等于发生论——这些艺术因素如果有所融合而形成一种文体”，是有可能“达到艺术品位的上乘”，“处于文学趋势的前列的”^[1]。也就是说，在“艺术性”这一命题之下，儿童文学决不是比成人文学“矮化”的文学。要是认为儿童文学是一种简单的文学存在就拒绝使用复杂深刻的批评理论，那是对儿童文学不负责任的态度。正如班马所言，儿童文学的特质完全可能使它向其他人文学科和多种文学批评方法敞开。反过来说，文学批评的理论和方法对我们思考儿童文学的审美特质也有着巨大的启发。

例如，俄国形式主义批评标举“文学性”和“陌生化”为文学科学研究正名，而儿童文学的每一种文体存在都应以“文学性”作为立身之本，它敦促着儿童文学研究者去挖掘和探索每一类文学样式的“主导要素”，这种质询和探讨无疑可以加深和拓展儿童文学美学理论的思考；“陌生化”作为旨在唤起人的艺术感觉的艺术技巧，既是成人文学的艺术追求，也是对这个世界已然熟视无睹的成年人回望儿童文学的特殊感触，更是保持和激活儿童读

者感受力的艺术“魔杖”，从某种程度上说，以陌生化手法拉开文学与生活的“距离”，从而更好地表达文学对人生的希冀和期许，在这方面，儿童文学甚至比成人文学走得更远。再如，叙事学主张区分叙事者和聚焦者，这对于儿童文学的创作和阅读都意义重大。对成人创作者来说，选择怎样的“叙事者”，才能既表达他的思想，又能吸引儿童读者？选择怎样的“聚焦者”，才能将儿童的世界“真实”地呈现出来，又能使成人步入“回望童年”的审美情境之中？对儿童读者来说，辨明叙事者和聚焦者的身份和写作技巧，既能让他们感受文学写作的奥秘带给他们的惊喜，又能让他们“站远些”“靠后些”，不受叙述者乃至作者的“意识形态操控”，逐渐成长和历练为一名反思性和批判性的读者。此外，精神分析批评关注流传久远的民间童话与现代儿童心理健康的关系，女性主义批评对女童成长和童书关系的思考，读者反应批评对儿童读者阅读反应的全面探索，都标志着某种文学批评理论在儿童文学领域取得了突破性的理论成果。

晚清以来，西方的理论资源和学术话语一直是中国各学科建设重要的背景资源，这在儿童文学中是个更加明显的事实，毋庸讳言。按照朱自清先生的推论，中国的儿童文学是先有理论（以周作人为代表），后有创作（以叶圣陶为代表）的，这样的事实也是对中国儿童文学受动发生的一个证明。及至21世纪，在全球化浪潮的席卷之下，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西方儿童文学理论建设超前于我们的身姿，这种构建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就是借鉴成人文学批评话语的结果。无论是布鲁诺·贝特尔海姆对儿童文学的精神分析批评，还是杰克·齐普思对儿童文学的意识形态反思，抑或是玛利亚·尼古拉耶娃对儿童文学整体的“人物修辞”批评，以及佩里·诺德曼对阅读儿童文学乐趣的全面探索，无不显示出学养深厚的理论家在儿童文学领域对成人批评理论有意无意的使用，他们的著述和言说又一次成为当下中国人思考儿童文学的重要理论参考。英国学者彼得·亨特在《导读：儿童文学研究领域的拓展》（见《理解儿童文学》）中直言：“儿童书是复杂的，而关于它们的研究也必

然是多元的”；“儿童文学研究者不应该画地自限，最好是博采各家的批评技巧”；当学术领域的“各学科的分野正在消解”，“本来就具有学科融合特质的儿童文学恰巧可以为这种趋势提供一种发展模式”；“正由于关注焦点的多元化以及表达声音的多样性，才使得儿童文学研究如此复杂迷人。”^[2]西方儿童文学研究的这种态势向我们昭示着成人文学批评方法与儿童文学理论建设之间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

除了研究成人文学批评话语与儿童文学理论建设的关系之外，本书更加侧重关注儿童的文学阅读实践以及指导儿童阅读的中小学语文教师的阅读实践。长久以来，中小学阅读教学的低效始终被多方诟病，原因之一就是教师的儿童文学素养低下。儿童文学素养建立在文学素养的基础之上，因此运用文学批评方法的知识来提高教师和准教师们的文学素养，这该是教师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无需赘言。问题的另一面在于：儿童读者可不可以运用这些多元复杂的理论方法去阅读他们手中的文学文本？以追求趣味和娱乐游戏为主要特征的儿童文学阅读与严肃理性的批评之间是否可以建立联系？儿童文学的阅读教学在这种联系的创建中有没有可为之处？

如上所言，多元的文学批评实际上都是从特定的视角对文学本质和规律的揭示，它们都具有方法论的价值和意义，它们的实践价值在于启发了读者丰富的审美经验的一部分。杨义曾这样描述方法的内涵：“方法是人类面对世界时自信的微笑和沉着的出招。”那么，成人批评家和教育者有什么理由不把这样的方法传授给我们的下一代呢？况且，“多元”本身的意义也是显在的，它对人的思维的引导是多向辐射的，而非单向灌输的，对比一下中小学语文教学中单一的“主题提炼”的教学模式，多元批评方法这样的“渔”显然会让少年儿童成长的步伐更加强劲有力。

文学阅读虽然是极具个性化的行为，但在儿童成长的过程中，成人的陪伴和指导却始终伴随左右，从亲子阅读到文学教学再到推荐阅读，成人的干预始终是个极为重要的元素，如何将这种可能是“暴力的殖民”转化为真正

的民主式的“对话”，这是儿童文学阅读问题的重点，其实可能也是一切儿童文化建设的基本思路。赵大军在他的博士论文《儿童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与方法》对成人批评者与儿童读者的“间性”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提出建立一种面对儿童读者的成人与儿童“共同游戏式”的审美诱导的儿童文学批评方法的理想，试图来解决成人主宰批评与儿童阅读实践之间的二律背反；《阅读儿童文学的乐趣》的著者加拿大儿童文学理论家佩里·诺德曼认为儿童是“缺乏必要的经验”的群体，成人要做的就是提供经验使他们“发展理解力”：“如果成人用自己讨论文学的语言跟孩子谈话，不仅能帮助孩子发展理解和欣赏文学的策略，也有助于他们感知和谈论所读文本的错综复杂性，从而让他们更喜欢文学。”^[3]也就是说，成人对儿童进行各种各样的文学阅读策略的教习将会更好地引领儿童与文学的相遇相知，从而使双方在这场“精神对话”中尽享文学的乐趣。

基于此，我们希望将各种文学批评方法运用于儿童文学阅读实践的例证，作为“理解和欣赏文学的策略”来与孩子们分享，既是在文学批评与文学阅读之间架设一座桥梁，也是对成人文学批评理论及其思考路径与儿童文学相结合的一次梳理，当然，更是一种试图实现成人教育者与儿童阅读者之间“对话”的努力。我们期待着，儿童读者能逐渐成长为“理想”的具有“主体性”的读者，正如艾登·钱伯斯所说：“读者是培养出来的，而不是天生的。”

注释：

[1]班马. 游戏精神与文化基因：班马儿童文学文论. 甘肃少年儿童出版社1994年版，第29页。

[2][英]彼得·亨特主编. 理解儿童文学. 郭建玲等译. 少年儿童出版社2010年版。第20-22页。

[3][加]佩里·诺德曼，梅维斯·雷默. 儿童文学的乐趣. 陈中美译. 少年儿童出版社2008年版，第49页。

目 录

第一章 社会历史批评对儿童文学阅读的启示	1
第一节 穿越历史的迷雾：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审视儿童文学	1
第二节 《稻草人》的时代内涵	9
第三节 从《哈克贝利·芬恩历险记》透视马克·吐温的儿童观 ...	17
第二章 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对儿童文学阅读的启示	27
第一节 回到文学自身：儿童文学的“形式”研究	27
第二节 节奏：儿歌的文学性	34
第三节 儿童诗“陌生化”现象探析——从邱易东的《寄给小城》 说起	46
第三章 结构主义叙事学对儿童文学阅读的启示	57
第一节 故事是如何讲述的：儿童文学与叙事学研究	57
第二节 “故事形态学”视野下的蒙古族民间童话叙述特色略论 ...	64
第三节 叙事视角的选择与成长主题的表达	74
第四章 精神分析批评对儿童文学阅读的启示	86
第一节 人性深处的潘多拉魔盒：精神分析批评与儿童文学	86
第二节 女孩子成长的心理奥秘——几则经典童话的心理学解读	93

第三节 试论根鸟的“梦”与拉康的“欲望”	104
第五章 神话—原型批评对儿童文学阅读的启示	113
第一节 集体无意识的奥秘：神话—原型批评与儿童文学	113
第二节 《哈利·波特》双重世界的原型解读	120
第三节 原型视野中的童话的分类	131
第六章 接受美学和读者反应批评对儿童文学阅读的启示	146
第一节 读者的权利：接受美学、读者反应批评与儿童文学	146
第二节 儿童文学欣赏的游戏特质及其表现	155
第三节 文本“空白”的“具体化”——以《汤姆·索亚历险记》 的阅读为例	163
第七章 女性主义批评对儿童文学阅读的启示	173
第一节 言说女性与女性的言说：女性主义批评与儿童文学	173
第二节 韩静慧儿童小说创作的女性主义立场	180
第三节 从女性主义的视角看安徒生童话中的“天使”	190
第八章 生态批评对儿童文学阅读的启示	201
第一节 文学的“绿色”之思：生态批评与儿童文学	201
第二节 汤·西顿动物小说的生态学立场	209
第三节 人与动物和谐共生的诗意书写——格日勒其木格·黑鹤 小说解读	219

第一章 社会历史批评对儿童文学阅读的启示

第一节 穿越历史的迷雾： 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审视儿童文学

社会历史批评是人类文学批评历史上最古老的一种批评方法，而相比之下，现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则是人类文学大家庭中新添的一个年轻成员。这二者的相遇是必然的，因为文学孕育诞生于社会历史生活，是一定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这条定律适用于古今中外所有的文学作品，包括儿童文学。

从世界儿童文学的头一环——《鹅妈妈的故事》算起，儿童文学就是伴随着欧洲启蒙运动而诞生的。虽然相比成人文学，儿童文学充满了更多奇幻荒诞的色彩，但无论以格林童话为代表的对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还是以安徒生童话为代表的作家原创，归根结底都是扎根于社会历史土壤而盛开的绚丽奇葩：民间童话、民间故事本就是以幻想的方式对民间愿望和诉求的表达，以安徒生为起点的现代童话创作更包含着创作者自己基于现实人生的丰富体验。汤锐曾在《比较儿童文学初探》中论及二战后西方儿童文学的总主题，即“学会生存”，从“牧歌时代”的温情浪漫、诗意葱茏，到“生存时代”的现实理性、冷峻客观，20世纪西方儿童文学“基于儿童个体的生存现状，

试图解决其生存的疑虑、抚慰其生存的孤独感、帮助其学会适应复杂的环境和保持生存的勇气。^[1]“学会生存”正是一个凝聚着成人创作者对儿童生存现实忧思的概括。可以说,儿童文学一路走来,在她成为人类文学大军中的一支劲旅过程中,社会历史现实都是注入其血液的最重要的内容。

在中国,“五四”时期儿童文学诞生于晚清以来社会思想文化变革的浪潮中,以叶圣陶为代表的创作童话一开始就“将成人的悲哀显示给儿童”,奠定了中国现实主义童话的发展道路;20世纪30年代的阶级斗争和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也深刻影响着张天翼等人的创作;及至50年代,社会意识形态的干预使中国儿童文学执着地行进在“社会主义教育的方向”上;80年代儿童文学复苏后,“塑造未来民族性格”的创作理念同样鲜明地烙印着文化传统以及历史时代的烙印。

不仅儿童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与社会历史息息相关,儿童文学文体的发展演变也是社会历史变迁的结果。王泉根在他主编的《儿童文学教程》中说:“儿歌、童话作为儿童文学中最古老的两种文体形式,是在古代儿童的游戏环境和人类的育儿环境中形成的,它们在印刷业落后的古代,是人类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的主要形式。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尤其是科学技术的日趋发达,儿童文学的文体也越来越丰富。例如,图画故事书的出现便是现代彩色印刷技术发展的结果,科学文艺是现代科学技术发达的结果,儿童电视剧和卡通片是当代科技成果综合运用的产物。”^[2]

社会历史生活与文学,包括儿童文学的这种源流关系使人们不可能不以社会历史批评的眼光来观照儿童文学。社会历史批评是从社会历史角度观察、分析、评价文学现象的批评方法,侧重研究文学作品与社会生活的关系,重视作家的思想倾向以及文学作品的社会作用。它最早可以追溯至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摹仿”说来概括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成为社会历史批评的滥觞。18世纪意大利哲学家维柯和德国哲学家赫尔德等人不同程度地发挥了这一主张。真正将社会历史批评发展为一种自觉的批评理论的是法国的斯达尔夫人和丹纳。前者从自然地理环境入手对欧洲南北方文学进行了分

析,后者则明确提出文学艺术的产生和发展取决于三要素,即“种族”“环境”“时代”。19世纪以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为代表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在理论和实践中对这一方法作出了实质性的贡献,使之成为当时最强劲有力的文学批评方法。20世纪以来,社会历史批评走向了进一步的深化,它从比较单一的对环境、时代、道德因素的关注,转向对文学与社会之间更为隐秘的深层关系的研究。卢那察尔斯基、卢卡契等将社会批评方法转向了意识形态批判,把社会学批评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法兰克福学派是当代德国最重要的哲学流派之一,本雅明、阿多诺、马尔库塞、弗洛姆、哈贝马斯等人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对资本主义制度对人的压迫、对人性的压抑的批判尤为令人瞩目。他们的学说使社会历史批评在各种文艺思潮多元共生的今天,仍然彰显着强劲的生命力。

社会历史批评是儿童文学阅读、批评乃至研究的有效选择,尤其是在中国,儿童文学的诞生和发展,恰逢我们民族从屈辱走向自强、走向崛起的充满血泪的百年,历史的风风雨雨成为涂抹儿童文学创作蓝图的基本底色。1922年,郑振铎在为中国第一部创作童话集《稻草人》所作序言中说,在“强者呼号着反抗,弱者只能绝望地微喟”的现代人间,是无法找到“美丽的童话的人生”的,“我们看圣陶童话里的人生的历程,即可知现代的人生怎样的凄凉悲惨,梦想者即欲使它在理想的国里美化这么一瞬,仅仅一瞬,而事实上竟不能办到”。所以叶圣陶的作品必然“不自觉地融化了许多的成人的悲哀”。对于叶圣陶童话中的这些凄惨的人生场景是否适合传递给儿童读者,郑振铎认为儿童“需要知道人间社会的现状,正如需要知道地理和博物物的知识一样。^[3]”从此,中国儿童文学的批评和理论建设就与社会历史批评结下了不解之缘。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其部分成员就如何办好左翼文艺刊物《大众文艺》的副刊《少年文艺》进行研讨,提出《少年大众》的办刊宗旨应该特别注意“给少年们以阶级的认识,并且要鼓动他们,使他们了解,并参加斗争之必要,组织之必要”。在发刊词中,它这样宣布了自己的抱负:“我们要告诉你们,过去是怎样,现在是怎样,将来又

是怎样。我们要告诉你们真的事情。这是我们新编少年大众唯一的抱负。”^[4] 响应时代的需求成为这一时期儿童文学理论建设和创作的最高目标。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以后，中华大地上燃烧的战火更迫使人们将儿童文学理论建设和创作纳入到“救亡图存”的轨道，战争从整体上一举将儿童文学推入贴近现实、反映现实、服务于现实的现实主义的艺术轨道。陈伯吹说：“今日的世界，已不再容许儿童做梦，狂风暴雨，阵阵地吹打，而且一阵加紧一阵……社会不让人们在观念世界里躲避，怎能让儿童在幻想世界中求满足呢？要叫儿童的小眼睛观察着，小头脑思考着这世界上的一切真相！”^[5] 与现实生活紧密相连、反映真实的现实人生成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特有的发展道路和艺术品格。

20 世纪 50 年代，受到苏联儿童文学的强势影响，再加上中国文学固有的载道传统和强烈的树人理想，使得中国作家和理论家对儿童文学的性质、功能等的认识渐趋一致：儿童文学就是教育儿童的文学。例如陈伯吹在谈到发展儿童文学事业的目的时说：“发展儿童文学，就是加强儿童教育。这无论从文艺的或者教育的角度看，同样是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的极其重要的政治任务。”^[6] 贺宜说：“每一篇儿童读物都应当有它的教育任务。我们要用动人的艺术形象和优美的思想感情来影响孩子们的的生活、思想和道德品质。”^[7] “任何文艺作品都有它的教育目的，但是什么也比不上儿童文学作品更需要明确鲜明的教育目的。”^[8] 这一对儿童文学政治教育功能的强调也勾画出此后直到 80 年代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整体面貌。对儿童文学的教育功能的强调本无可厚非，但是过分地强调同时又与阶级斗争、政治任务等意识形态的内容相捆绑，显然会陷入理论的迷雾和创作的泥潭。由此可见“左”倾政治思潮和庸俗社会历史批评对此段中国儿童文学的消极影响。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的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一样也经历了政治上和文学上的拨乱反正，重建人的意识成为这一时段中国儿童文学的首要追求，作家开始在儿童文学创作中正视少年儿童真实、复杂、立体的个性和人性，探寻其与成人世界的双向关系。刘健屏的《我要我的雕刻刀》、陈丹燕的《上